

名人·知识分子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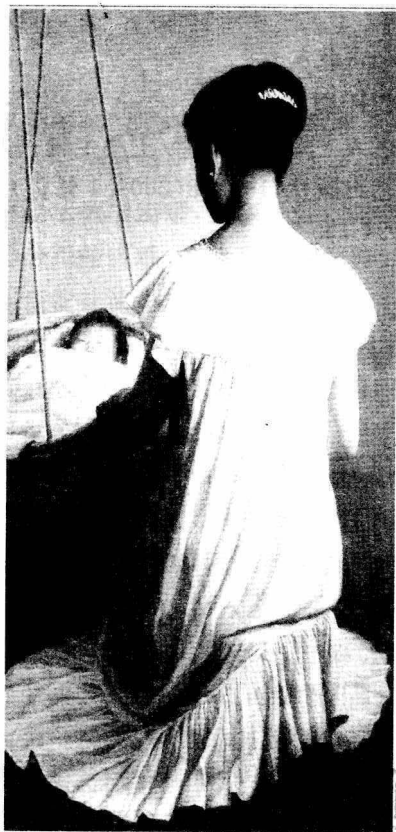


写给妈妈的话丛书

写给妈妈的话

大众文艺出版社

名人·知识分子卷



给妈妈的话丛书

妈妈的话 写给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写给妈妈的话:名人·知识分子卷/王晨主编;《光明日报》社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5.8(2009.1 修订)

ISBN 978-7-80094-155-9

I. 写…

II. ①王…②光…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4954 号

写给妈妈的话

(名人·知识分子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90 千字

2009 年 1 月修订版 200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978-7-80094-155-9

定价:29.5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序

全国青联主席 刘 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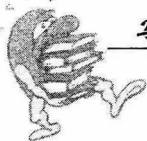
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即将在北京召开之际,我郑重地向与会的各国代表和社会各界读者介绍《写给妈

1

妈的话》丛书。

前不久,经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中国组委会批准,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委托,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主办了“写给妈妈的话”和“向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献辞”的征文活动,由《中华儿女》《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四家联合编辑,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丛书就是对这次征文活动的圆满总结。这次征文活动收到了6300件,10000余份来稿。

可以说,文章的作者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层面。有作家、艺术家、社会名流和共和国的部长们,有普通工人、农



民、知识分子、军人和许许多多的少年儿童，有卧病在床的病人，还有正在服刑的犯人。是对母亲的拳拳之心将大家的情感汇合在一起，成为一股爱的洪流，这种情感也是我们对世界妇女大会在京召开的最好献礼。

母亲是最伟大的，母爱是最无私、最纯洁的。仔细体味这种母爱是对自己灵魂的一种净化、一种升华。同时，也使我们拥有了一种责任，一种对生我养我的母亲的责任，一种对我们祖国母亲的责任。



目 录

时时想着她·····	邵华泽(1)
革命的妈妈 高尚的妈妈 ·····	伍绍祖(3)
慈 母 ·····	李 琦(16)
寸草心 ·····	江修惠(24)
坚强的母亲 ·····	王景清(29)
梦里依稀慈母情 ·····	高占祥(36)
永不泯灭的追求	
——回忆我的妈妈张茜 ·····	陈昊苏(44)
母亲,一首唱不尽的歌·····	李光曦(59)
中国母亲精神礼赞 ·····	王 东(66)
艰难而坦然的一生 ·····	朱琳(75)
娘是天上星 ·····	三 儿(82)
令人悲愤的回忆 ·····	涂益训(92)
深沉的爱 ·····	陈 潇(99)
妈妈,故乡的麦子熟了么? ·····	王泽鹏(103)
娘·····	柴培军(108)
勤劳一生的侗家人·····	陆景川(113)
母亲的伟大·····	韦 谋(117)
慈祥的母亲·····	徐龙年(121)
苦命母亲好后娘·····	许承芹(124)



当树不当藤.....	刘社民(130)
平原上的母亲.....	浪中石(135)
先赴国难后说家事.....	高子君(138)
凡人的心愿.....	王太吉(146)
永远不忘妈妈的嘱托.....	郭同文(153)
敬礼 妈妈.....	衣向东(158)
母亲与水稻.....	谢新吾((162)
乐在其中.....	杨 鹏(165)
心灵中的殿堂.....	胡克正(172)
我的母亲.....	齐荣钰(176)
历尽坎坷路.....	叶宝珊(182)



时时想着她

■邵华泽

关于我的母亲，至今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但我从心底里时时想着她。

我的母亲，是一位普通妇女，一个字不识的农家妇女。她慈祥、勤俭、善良，肯帮助人。在我们那个一百多户的村子里，凡知道她的人，没有不夸她的。

听说，我母亲小时候生活很苦。因家境贫寒，她弟弟又体弱多病，所以小小年纪就下地干活，风里来，雨里去，也许正是这种艰苦，磨炼了她的意志和品格。

有几件小事是我终身难忘的。

我的家在浙江西部淳安县一个很偏僻的农村。父亲是农村私塾老师，那时教一年书仅得几担粮食，家庭经济不富裕。我的大哥从小务农，连自己姓名都不会写。我二哥念书，但不幸英年早逝。全家都寄希望于我。父亲更是恨铁不成钢，对我学习上的要求极其严厉，真正是一位“严父”。我上学不久，他就要求我练习毛笔字，一天一张小字，一张大字，隆冬酷暑都不例外。记得八岁那年夏季的一天，邻居一位叔叔给几个小朋友讲三国演义，我是第一次听这么有趣的故事，全神贯注，听得津津有味，把写字的事全丢到脑后了，吃晚饭前到家才想起来，可这时要补救已来不及了。父亲知道后大怒，用木尺打我手心，十大板子，手肿得连饭碗都端不住了。母亲见到我，掉出了眼泪，但她不是简单地同情我，而是借此机会给我讲道理，说一个人从小要有志气，该做的事就要坚决去做，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人还要守信用，自己答应做的，就要做到，否则，养成一种懒懒散散的习

惯，长大了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父亲的十大板和母亲的一席话，使我小小的心灵受到很大震动，从那以后，我学习更用功，再也没有被父亲打过手心。

在我十岁生日的时候，母亲用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一块质地较好的花布，给我做了一件长衫。这花布很素雅，我很喜欢，但是只穿了几次，洗过之后晾在外边被人偷走了，我很伤心，母亲当然也很难过。后来还是她开导我，说一个人衣服穿得漂亮当然好，但是做的事不好，还是会被别人瞧不起的。她是在安慰我，更是在教育我：人活着要有志气，要有本事，品行要端正，这样人家才看得起。

1950年冬我正在浙江建德县的省立严州中学念书，为了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报名参了军。建德离家乡有100多公里，因为事情急，报名时来不及征求父母的意见，离校之前也没有能回家去看看他们。因为家里节衣缩食供我上高中，本来是期望我将来上大学，所以我一直有些内疚，怕参军一事伤了他们的心。第二年母亲到上海部队来看我，我给她解释当时决定参军的心情和没有办法同他们商量而感到的不安，谈入伍后感受到人民军队的温暖，她没等我细讲，就说：“你不要把妈妈看成是落后分子，我们在村子里也组织学习，也懂得很多道理了。爸爸妈妈都支持你为国家出力。”简短的几句话，朴实、有力，真是知子莫若母，听了之后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感激的热泪。

1976年11月29日，母亲默默地走完了一生，因脑溢血去世，终年76岁。那时我在《解放军报》时事政策宣传处任副处长，正好处长在五七干校，由我主持工作，无法回老家处理丧事，便请我夫人回去了一趟。直到1982年父亲逝世我回家时，才在母亲的坟上献上了我的一束鲜花，心里默默地祝愿：安息吧，亲爱的妈妈。



革命的妈妈 高尚的妈妈

■伍绍祖

10年前——1985年4月7日，我妈妈还差3个月就要满83周岁时，突然去世了。这天是星期日，早上起床后，她说昨晚胃疼，还感到胸闷。我和我爱人曾晓前联系到她1958年就发现患有冠心病的病史和由于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非常劳累的情况，马上就想到，可能是她的心脏出了毛病。我立即打电话请我当时所在国防科工委的医生来诊治，并通知妈妈的合同医院——北京医院的急诊室来人检查病情。正巧那天上午10时我要陪同国家主席李先念会见来访的意大利国防部长斯帕多里尼，还未等医生到，就把妈妈托付给我爱人，匆匆赶到人民大会堂去了。11点多我赶回家里，见到两个单位的医生都来了，得知妈妈患的是大面积心肌梗塞。由于中午我还要陪同国防部长张爱萍宴请意国防部长，即由我爱人陪同送妈妈去住院。下午1点多我回到家，医院来电话要我立即去。当我下午两点赶到医院妈妈已不能自主心跳和呼吸了。据我爱人讲，中午12点多妈妈入院时，病房搞错了，上了病床后又折腾换住另一个病房。安顿下来后，妈妈精神尚好，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安详地与我爱人说话。她估计一下子回不了家，要我爱人没事了就早一些回去，别忘了交房租水电费，别忘了明天把她的制服外衣带来，她还要从医院去参加本次政协全体会议闭幕式。同时还谈到，4月8日是我46岁生日，可能过不成了，只好以后再说吧。1点多钟，医生正在给她量血压，突然发现血压急速下降，接着妈妈昏死过去，再也没有醒来。按照妈妈生前的意愿，遗体交有关部门解剖研究用。后来医院告诉我们，妈妈致死的原因是心脏爆



在 50 年代，妈妈就对我讲过，人要死的话，最好一下就死，不要拖，否则自己痛苦，也给组织上带来许多麻烦。妈妈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可以说她 60 多年的革命历程，都是视死如归。在我妈妈去世的同时，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也在医院中因患心脏病被抢救，在我妈妈去世几日后也去世了。按我妈妈的观点，她比伯钊阿姨算是幸运了。我心里明白，人总是要死的。妈妈在那样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上活到 83 岁，也算是长寿了。但她走得是那么突然，妈妈和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我心里也是十分难过和悲痛的。

4 我的妈妈是革命的妈妈。从大革命到新中国，每一个革命历史时期，她都是积极参加、忘我战斗的。如果没有像她这样的千千万万的革命先驱英勇奋斗、流血牺牲，中国革命如何才能胜利。我妈妈步入中年以后，基本上是做机关工作，成天就是抄抄写写、收收发发，没有做出什么震天动地的事情来。如果没有像她这样的无数的安于平凡、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革命也不能成功。

我妈妈出生在一个破落官僚家庭，我外祖母尹翔凤可能是一个受新思想影响的女子，不仅女红、字画水平高，而且亲自办新学，放小脚，也给我妈妈放了脚。在外祖母的影响下，我妈妈先在南京上中学，又在上海上大学。从 1920 年开始就投入了“学潮”，1923 年被选入南京市学联。在人生的旅途上，她放弃了安稳做遗少的生活，而选择了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1926 年至 1927 年，她参加上海工人 3 次暴动，特别是在第 3 次暴动中，她作为工人纠察队的一个分队长战斗在第一线。她与另外一名男同志孟超到上海天通庵车站附近，撬了一段铁轨，破坏了信号扬旗，阻止了军阀部队从铁路进入上海。“三暴”胜利后，她被选为上海市临时政府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她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在嘉兴农村躲避追捕。后在组织的安排下，她坐在轮船的舱底去了当时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苏联，后又被派到远东海参崴煤矿工作。当祖国需要一批干部回国抗日时，她毅然



放下了在苏联生下的两个女儿，回国搞地下工作，在上海国民御侮自救会任党团书记。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取名伊斯科拉，俄文意为“火花”，一个取名为卡拉，是卡尔。马克思的名字后面加一个代表女性的“A”。后来也给我取了一个俄文名字叫沃瓦，是列宁的小名，寄托了她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和对美好前景的憧憬。回国后不久，地下组织被破坏，她被捕入狱。在狱中患了肺病，大口吐血，同时积极参加狱中党组织领导的各种斗争。西安事变后，她和赵世炎的夫人夏之栩、陈庚的夫人王根英经党中央派人认领首先出狱后，便立即投入营救工作，使仍在押的难友（包括陶铸、钱瑛、肖桂昌等一大批人）分批出狱，那时她已是骨瘦如柴了。后她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工作，完全是在敌人严密包围和监视下生活。1939年生了我以后，由于组织上照顾，妈妈带着我撤回延安，生活更是极其艰苦。再加上我弟弟夭折，妹妹胎死腹中，给我妈妈在身体上和心理上造成极大损害，致使我妈妈1942年肺病复发，住进延安中央医院，卧病15个月之久，其间曾数次病危，棺材和寿衣都准备好了。幸而毛主席给了一种药，名叫“肌乖布拉托”（这是我听妈妈讲的音，不知是什么药），妈妈才奇迹般地病愈出院。棺材给别的同志用了，寿衣直到上中学时我还穿着。这场病使妈妈没有参加上延安整风，成为终身遗憾。出院后，妈妈仍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任建设厅合作局局长，并任边区妇联副主任。胡宗南进攻延安时，她以边区妇联的名义发表文告，号召边区妇女行动起来，反对内战保卫延安。那时我正随延安“保小”行军，我父亲伍云甫在上海作为中共代表团方面的工作人员与国民党反动当局斗争。我妈妈真可谓“夫离子散”，孤身一人随军转战陕北，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和支前工作。1948年春到石家庄，任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工业合作组组长，总算是与在石家庄附近西柏坡党中央机关工作并兼任解总秘书长的我父亲会合了。同年秋又调至北平工作组准备接管北平的工作。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她任内五区委书记，不久她又调到内务部（后改成民政部）做优抚、救灾和



社会福利工作，一直到死。我妈妈从18岁投入反抗旧中国的社会活动，21岁投入党领导的革命运动，2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革命胜利时已经是47岁了，在新中国灿烂的阳光生活了36年。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革命者，她一直怀着满腔热情，孜孜追求美好的未来，精神矍铄地工作、生活，从不消极。

我妈妈为革命吃尽了苦头，但她的人生升华到了高层，如果有人能超渡的话，她一定是得善报的。她中学时的一位同窗好友，叫罗玉君，在我妈妈投身革命时，到法国留学去了，后来与一位中国留法学生李珩结为夫妇。两人感情笃深，事业有成。罗是翻译家，曾送我妈妈一本她翻译的法国小说《城与年》，李是天文学家，解放后受到党和政府的重用。他们住在上海的一座花园洋楼内，六七十年代，每次我到上海，都要受妈妈之托去看望。

6

罗玉君作为一个文学人士，心情是复杂的。她对我说过，她的生活是十分优裕的，在法国那才是“真正人的生活”，同时对我妈妈又十分崇敬和羡慕，尽管我妈妈过的是“非人的生活”，建国前是食不果腹，建国后也是节衣缩食，居住条件也差，一生中除了大革命失败后流亡苏联外，从未出过国。但罗玉君感到自己的成就感不如我妈妈，幸福感也不如我妈妈，特别是当她的儿子、我清华大学的同学在国外学习时被台湾一女士“勾引”走以后，更是如此。恐怕这里面的差别就在于一个人的一生与人民解放事业的结合程度。罗玉君两口子的生活应当说是幸福的，而我妈妈却更加幸福，而且是在更高层次讲的。这里又涉及到人生观——人为什么活着，怎么活才有意义——这样一个古老的命题上了。

我的妈妈是高尚的妈妈。她的高尚之处在于，她把个人的利益完全融进了民族的、国家的、党的、革命的、阶级的、人民的利益当中去了，在需要她做出牺牲的时候，为了大局，为了整体利益，她义无反顾地放弃个人利益，体现出一个革命者的觉悟、道德和情操。前面讲过，当她豆蔻年华选择人生道路时，她选择了革命；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共产党员自首、脱党，她选择了继续



革命,在艰难的条件下去到苏联;当中国革命需要的时候,她舍下了亲爱的女儿冒死回国。1933年5月20日,她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在敌人进房以前,机警地处理了党内文件,并发出警号,通知其他同志转移。被捕后,她原来的丈夫变节,声明不再干共产党,而我妈妈宁愿脱离夫妇关系也不自首,在法庭上大义凛然,未吐任何口供,毅然进入牢房。这是她个人生活的悲剧,却凸现出她的高风亮节。我们全家在这个问题上都非常理解妈妈的痛苦,崇敬她的人品,小心谨慎地从不触动她的痛处。1948年夏天,我们家终于团圆了,此后我军在解放战争中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在这一年末,平津战役之前,我妈妈受命在彭真领导下参加接收北平的工作。临走的时候,我爸爸在西柏坡,我妈妈在石家庄。我跟着其他同志的汽车去石家庄送我妈妈上前方。那天晚上妈妈紧紧地抱着我睡了一晚上,第二天就英姿飒爽地走了。作为一个革命家庭,多少次悲欢离合,多少次生死离别,都体现了一种“从容就义,慷慨赴死”的精神,这对我影响极大。进入新中国的时候,她的心情是兴奋、喜悦、充实、满足的,对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各方面的准备是不足的,在工作中和政治运动中经常受到批评甚至批判。现在看来,对她的许多指责是不正确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反映了我们党内生活的某些不正常、不健康的方面,但她都能从党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大局出发,忍辱负重,正确对待,坚守革命到底的信念。“文革”中我们全家都受到冲击。我爱人是杨尚昆“死党”曾三的女儿;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找回来的我二姐伍绍云(卡拉),被诬成“苏修”派来与我妈妈接头的特务;我是全国学联主席,当然在劫难逃。1969年春夏之交,除了我爸爸瘫痪在家外,都要下各自单位的干校。分别时,我们都没有哭,就像各自走上战场一样,去接受新的战斗考验,创造人生新的历程。对此许多人都不理解,而我们好象已经习惯了。

“文革”对我妈妈的打击是最大的了。一开始说她是“三反分子”,相继而来的帽子有“走资派”(因为是老革命、高级干部),



“叛徒”(因为进过国民党的监狱)、“苏修特务”(因为在苏联学习过)、“现行反革命分子”(因为有人揭发她骂过江青)。每一顶帽子都伴随着一段时间的残酷斗争和人身侮辱。她被打骂、批斗、戴高帽、游街、住牛棚、劳动惩罚,大概除了没有把她关进监狱外,什么罪都受过了,但她还是坚强地活着,巧妙地斗争着,甚至运用住国民党监狱的经验,说服看押她的同志,在给她送饭和用品时夹带字条,传递信息。“文革”开始后的前几年,她长期被“专政”,经常不能回家,但只要一有机会回来,我们全家就开“紧急战斗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我们的原则是,坚信党和群众,对革命绝不动摇;坚持实事求是,对人对己都不胡说。我父亲这边也受到很大冲击,尽管他已重病在身,右半身瘫痪了,仍被抄家10多次,连地板底下都搜查到了。专案组的人还时不时地到家里来批斗他,因为他当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成千上万的抗日青年就是通过这里进入延安,所以不顾他身体不好,每天都安排好多人来找他进行外调,致使他1969年7月仅65岁时就被迫害致死。当爸爸患脑溢血病危时,我们全家其他人员都分别在各自的干校,待我们冲破重重阻力赶回来时(我直接打电话给驻内务部军代表,要求让在湖北沙市劳改的我妈妈回来,内务部军代表万海峰同志批准了这一请求;我是不顾驻团中央军代表的不赞同而强行回来的),他已全身瘫痪,讲不出话来了。我们想尽办法救治父亲,包括我们极不情愿地写信给曾与我父亲一起工作的、当时仍在台上的汪东兴,但是仍然没有能够挽救父亲那不算老的生命。1969年7月25日上午9点多,我和妈妈及全家人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最亲爱的亲人——这个我们认为是最忠诚、最无私、最英勇、最高尚的共产党员死去。当时我们都表现得非常镇静,就像目送一位战友出征一样。

回到家里,我翻到了我爸爸犯病前3天即7月8日用左手写的两页纸,其中写到“我相信党和群众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自己心中无鬼,自己心中有底,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为名,不为



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许多烈士已英勇牺牲了,自己是幸存者。”“比一比过去,比一比劳动人民。”字是用红笔写的,按中国的习俗,这就是“绝命书”,是一篇表明自己心迹、表明自己境界的遗嘱。看了这份“绝命书”,我禁不住嚎啕大哭,妈妈也大哭起来。这是在家里,是我们在与社会风浪的搏击中深深的港湾,因此我们都放声地哭了起来。

不久后,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来看望妈妈,我妈妈悲怆地说了一句:“云甫真是生不逢时,死不逢神啊!”我真担心妈妈会像我弟弟那样哭疯了,讲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又给她带来新的麻烦,但她挺住了,很快恢复了常态。办完丧事后,我们全家人又准备各奔各自干校。在临行前,我妈妈清理了她和我父亲一生的积蓄,一共有两万多元。爸爸生前嘱咐,他遗留的钱全部交党费。根据我父母工资收入的比例,算在我爸爸名下应当是1.5万元左右,为了凑一个整数,我妈妈就交了2万元。那时,我妈妈还属于专政对象,一个月发20元生活费,我们家里除了一台北京牌14寸黑白电视机外,没有其它奢侈物品。我完全理解妈妈的心思,她是想用此证明我们是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为钱的,共产党里还有好人;表明她对党的信心,对自己的信心。那时我爸爸、妈妈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是600多元。两万元,在当时来讲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它是靠我妈妈省吃俭用,一点一滴积攒下来的。我们家生活艰苦朴素,我们也养成了不乱花钱的习惯。我那时一直过着集体生活,虽然是全国学联主席,一个月才有46元收入,但是我仍能省出二三十元交给我妈妈。1978年6月我从上海赴江阴途中因车祸而负重伤,我妈妈当时正准备去陕西出差。有人劝她到上海看看我,而她说,他受伤有医生诊治,我去了也没有什么用。这就是一个高尚妈妈的情怀,在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矛盾时所做的很自然的选择。

50年代初第一次定行政级别时,与我父亲一样,她主动地要求降低一级。她长期做优抚和救灾工作,所以她经常是在我国最贫困的地方和最普通的群众中活动的。最近,我偶然遇见



我妈妈在内务部当司长时农村救济司的秘书陈友三老同志，他满怀真情地对我说：“你妈妈真是个好入哪！那时你家住在东城，你妈妈每天坐公共汽车到西城的机关上班。有时你爸爸从西城开会回去，想用他坐的小汽车带她走，都被她拒绝了。1957年有一次我陪她到江西出差，要到井冈山工作（那时这里还没有开发成旅游区，只是一个贫困的老革命根据地），省委要派汽车送她去，她不坐，一定要自己买票坐长途公共汽车上山。她知道山上生活条件差，为了不增加当地政府的负担，自己带着干粮就去了。”我猜陈老也有七八十岁了，他对我讲这些事情时眼睛含着泪花。我完全相信他的话，因为我小时候受到父母的教育，也是轻易不坐他们的工作用车的。有一次我上火车站，我爸爸也要乘火车赴外地，但我们就是分别走的。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也许太过分了，但我们确是很认真、很执著地这样做的。当时有些做法也许不太可取，但却从这些小事上反映了我妈妈及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者情操的高尚。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我妈妈真是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她身体很不好，多种疾病缠身，有病痛就自己忍着，把它顶过去。在新中国成立后，我记得她只住过三次医院，一次是在生煤炉取暖的家中她与和我一起煤气中毒，住院3天；一次是阑尾炎开刀，住院5天；最后一次是住院两小时，在医院去世。这和一些革命意志衰退者，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我的妈妈是亲爱的妈妈，我们的家庭是革命的家庭，大家都忙于自己的革命工作，经常是天各一方。在我父母的孙子辈结婚的时候，我和我爱人为了向他们进行家庭传统教育，曾总结了我们家庭的特点：民主、平等、团结、和谐、亲密、温暖、朴素、正派、真诚、坦白、高尚、美好。总之是非常幸福美满。我们都是无产阶级，也从不追求豪华的生活，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非常充实的。我妈妈是一位极具母性的人，对子女十分疼爱。在延安时，我弟弟伍绍宗患百日咳，由于当时条件艰苦，不治而亡。我妈妈哭了3天，连叶剑英都来信安慰。对我这个唯一在她身